

CHAOXIANSHIXUESHIYANJIU

(增补版)

朝鲜诗学史研究

李岩 著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自序

朝鲜诗学，是其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诗歌发展的必然产物。二者互为表里，但朝鲜诗学还是以其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其有关诗歌本身的理论探索为前提。朝鲜诗学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尤其是其社会大转折时期的诗学观念，反映自身的时代内涵，刻画出独特的演变轨迹。应该知道，朝鲜历来深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一向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汉文学为正统文学，即使是后来它的国语“训民正音”颁布以后，其官方和民间也坚持这种文化惯性。因此，我们在此所说之“诗”，即指汉诗，所指“诗学”，也就主要囊括汉文学范围的“诗学”。

朝鲜自高丽以来其大部分时间都维持文人执政，文治主义是它一贯的政策，而诗歌又是它文治主义理念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把它叫做“东方诗国”，是有其缘由的。所以它的诗学主体，基本都是文人阶层，而他们往往兼有诗人、诗论家和哲人三方面的品格。因此诗话是朝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文人喜用的诗学文体形式。自从高丽李仁老的《破闲集》出世以后，一直到李朝末叶，诗话著述层出不穷。朝鲜诗话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使得它能够充分融合自身对创作经验的回味、诗歌本质的冥想和“天理人心”“道文一致”“情动形言”的哲思等，构筑自身鲜明的诗学观念特色。如高丽崔滋指出：“诗者蹈道之门，不涉不

经之语。然欲鼓气肆言，竦动时听，或涉于险怪。况诗之作，本乎比兴讽喻，故必寓托奇诡，然后其气壮其意深其辞显，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若剽窃刻画，夸耀青红，儒者固不为也。虽诗家有琢炼四格，所取者琢句炼意而已。今之后进，尚声律章句，琢字必欲新，故其语生；炼对必以类，故其意拙。雄杰老成之风由是丧矣。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崔滋的这番话，如实地反映出高丽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其中还渗透着文学创新原则、创作应该达到的境界和审美理想。之后的朝鲜诗歌，虽有一系列闪光的创新，但其基本思路还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20年前，笔者在韩国出版过一本有关诗学的小书，颇受行内重视，但内容简略，许多话语没能充分地表述出来。后来此事总使我耿耿于怀，想日后一定要修改补充，将应该论及的话语记录出来，以飨读者。光阴如箭，20年后的今天，世界发生了莫大的变化，学术文化更是一泻千里。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虽旧作重提，但只能补充想说的一些话题，以慰久违的念想。

顾名思义，本书是对过去相关成果的增补版，在修订过程中对一些章节进行了修改和增补，目的在于使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本书的主要意图，只是想通过论述我们的邻国、曾经属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的朝鲜各个时代诗学的基本内涵和特点，把其诗学脉络和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展现给读者，以增强最基本情况的了解。

我们期望，随着学术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朝鲜诗学的知识和学术成果，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用与中国文学乃至诗学比较的眼光审视它，它既是一门显学，有

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尽管它深受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它也是一门外国文学理论体系，可以给我们带来鉴影度形的知识和启迪，而且也多少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现实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愿这本不起眼的书，一旦出版，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李 岩

2015 年 6 月于北京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高丽时期的汉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想	1
第一节 高丽时期的“文运昌盛”与文学思想	1
第二节 文坛局势与诗话的繁荣	9
第三节 高丽诗话的起因与发展轨迹	30
第二章 李奎报文学个性论和民族审美观	45
第一节 “语意得双美”的文学思想	45
第二节 李奎报《东明王篇》的审美倾向	55
第三章 朝鲜朝前期诗话发展及诗歌理论	71
第一节 诗话的发展	71
第二节 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论文学本质	76
第三节 李济臣《清江诗话》的“诗画一品”说	94
第四节 李晬光“自然”本色之美的文学观	106
第四章 许筠的思想与诗学理论	131
第一节 尊“天禀”思想与文学创新论	131
第二节 唐宋之辩与诗歌发展论	146
第三节 对模拟之风的批判与文学创新意识的建构	168
第四节 诗歌的本质和本国诗歌	175
第五章 李瀾的诗学批评意识	196
第一节 《星湖僊说》的文学情感论	196

第二节 李瀲的文学“致用”观	211
第六章 朝鲜朝思想文化与《诗经》学接受史考察	234
第一节 《诗经》接受史考察	234
第二节 对《诗集传》权威性的挑战与学术反省 气氛的渐炽	265
第七章 17、18 世纪民族意识高涨时期的文学观念	288
第一节 民族意识的高涨与文学思想	288
第二节 朴世堂《诗经思辨录》的时代精神	298
第三节 洪大容《大东风谣序》的美学意义	311
第八章 朴趾源美学思想及其现实主义民族文学观	327
第一节 《热河日记》的实学精神和文艺观	327
第二节 “虚”与“实”的美丑观	343
第三节 艺术美寓于大自然与生活之中	351
第四节 画论及其美学意义	358
第五节 “即事有真趣”的现实主义精神	372
第六节 “切近情理,模写真境”的写实主义 描写原则	381
第七节 从“法古而知变”到“创新而善变”的文学继承 原则	394
第八节 以“合变之机”掌握“制胜之权”	418
第九章 19 世纪前半期的文学思想	433
第一节 丁茶山政本位的文学实用观	433
第二节 金正喜的文学“性灵”说	465
第三节 崔汉绮的杂文艺观与“今古之辨”思想	476
第四节 中朝实学思潮及其文艺思想之异同	489

第一章 高丽时期的汉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想

第一节 高丽时期的“文运昌盛”与文学思想

随着新罗王朝的全面衰落，各地的地方封建势力利用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纷纷起而拥兵称霸，以武力对抗中央王朝。到了10世纪初，在朝鲜半岛出现了后三国（后百济、泰封国、新罗）鼎立的局面。后三国的存在十分短暂。以王建为代表的高丽新兴封建势力经过艰苦的斗争，重新以武力统一了朝鲜半岛，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建立以后，吸取新罗灭亡的教训，确立和完善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物质经济基础。同时推行各项劝农政策，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稳定措施，从10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后半期的100年里，高丽封建国家迎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升平时代。政治经济的这种繁荣构成了高丽科学文化普遍繁荣的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高丽王朝也实行了相对自由的政策，统治者认为儒、佛、道以及阴阳五行说、风水地理说等都对保佑王朝平安、笼络人心方面有作用，从而开始信奉并重视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天文、数学、医学、地理、印刷等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建筑、工艺、美术、舞蹈、音

乐、文学、雕刻等艺术的各个分支，在充分吸收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

建国以后，高丽王朝的思想领域里佛教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高丽时期的佛教竭力以“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等神秘主义的教理宣扬护国护王，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高丽历代国王和上层贵族均笃信佛教，不惜动用大批人力和物力，到处修建寺庙，大量出版佛典，并扩大寺院经济。高丽王朝之所以积极扶持佛教，用当时人的话说是因为“释道”就是“救”世之道。太祖王建在建国不久发表的《十训要》中首先指出：“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对于倡佛的政治目的，在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尽管如此，高丽时期的佛教在实质上并没有上升为王朝的正统思想。高丽的统治阶级认为“释家之道乃来生之资”，而不是现世治家之本；它只有修身之功，而无理天下之力。正因为这样，当高丽的统治者们考虑治天下、理家国之大事的时候，选择了儒家，把儒家思想当作王朝的统治理念，奉为维护封建体制的正统思想。据《高丽史》记载，太祖王建于936年统一三国不久，为训示“一王统属万民之理”，“上敬下顺之大义名分，官人可行可守之规范”，亲自撰写《政戒》一卷和《诫百僚书》一篇，颁布于海内。在他晚年，又为后嗣著《信书》及《训要十条》以为龟鉴。《训要》第七条指出：“人君得臣民之心为甚难，欲得其心要在从谏远谗而已，从谏则圣，谗言如蜜，不信则谗自止。又使民以时，轻徭薄赋，知稼穡之艰难，则自得民心，国富民安……垂仁之下必有良民。”其十条又云：“有国有家，傲戒无虞，博观经史，鉴古戒今。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

戒成王。”高丽太祖崇儒尚文的政策，为其后的君王继承并有所发扬。如光宗采纳后周人双冀的意见始设科举以“明经”“诗颂”类试取人才；成宗广设学校，完善礼仪制度；显宗广修国史，表彰有成就的弘儒文士；靖宗“励精文治”，大量雕印《礼记正义》《毛诗正义》等儒教书籍。在儒、佛、道三教之中，为什么选择儒教来当作王朝的统治理念呢？对此，历太祖到成宗年间的六朝老臣崔承老在给成宗的上书中说道：“三教（指儒、佛、道）各有所业，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今日之务，今日至近，来生至远，舍近求远，不亦谬乎？”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儒教思想成为整个高丽时期发展政治经济、笼络人心、巩固王朝统治的指导理念。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高丽的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禁锢其他思想，实际上在高丽社会中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一般老百姓，对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都可以任意地信仰和膜拜。这种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成为高丽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在日趋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和这种比较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下，从高丽初期开始，文学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时期文学的发展，首先以汉文学的普及为基础，而汉文学的普及又赖于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和奖掖政策。具体地讲，统治阶级推行的三种措施，对汉文学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高丽的统治阶级为了普及儒教文化和培养对其有用的人才，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太祖王建刚建国则创置学校，命诸名儒聚徒教之。成宗时也大量营造学舍、书斋，广募州郡县子弟到京习业，学徒乘风而至。另外，全国各地设乡学

堂，并派通经达籍之博士教导在乡子弟。到文宗时私学大盛，仅在京城开京就有名儒大臣开办的 12 所著名的私学堂。这些学校所学课目主要有四书五经、武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其中四书五经自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各路两班子弟云集学堂，系统地学习儒学和文学知识，“观者莫不嗟叹”。学校教育引起了社会对汉文学的向学热，促进了对中国和朝鲜古典文学的理解和掌握。于是高丽前半期的文风渐盛，名家蔚然而起，出现了朴寅亮、金黄元、郑知常、金富轼、尹彦颐、金仁存、权适等学子出身的著名诗文大家。

二、在人才登用制度上，高丽王朝于光宗九年（958 年）根据留用的中国后周人双翼的意见实行了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科目主要有制述业、明经业、医卜、律算等杂业，其中选取文官的科目为制述、明经二业。制述业的考试内容为诗、赋、颂、策，明经业的考试内容则是《周易》《春秋》《尚书》《毛诗》《礼记》等四书五经。二业之中，国家更重视和需要的是“主文艺之制述业”。据统计，在整个高丽时期以明经业被录取者只有 420 人左右，而以制述业被登用者超过 6000 人，从中可以看出高丽王朝对汉文学的热情和重视。高丽的科举制大致参考中国唐、宋的科举制度，它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才吸收进王朝政权，造成人才流向的单一化，知识分子除了彻底依附于它别无出路。高丽“国俗贵制述，贱明经”，要挤进宦途，则必须科试入榜；要榜上有名，就只能苦练汉文学的本领。于是全国无数学子以其毕生精力刻苦读练，以求功成名就。由此，文士见重，文风大兴。这种科试制度对汉文学的普及和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尽管“且其倡以浮华之文，后世不胜其弊”。

三、在统治阶级直接倡导下，汉文学成了人们政治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高丽历代国王大都是“好文之主”，他们一般都能文善诗，并特别看重那些有才华的词臣。他们经常设宴举行宫廷诗会和野外赛诗会，聚集词臣和文人让其尽情比试诗才的高下，对优胜者给予奖励。成宗朝开始实行“文臣月课法”，规定所有在中央和地方的文臣每月作诗三篇、赋一篇上交，根据优劣褒贬之。汉文学简直成了人们升官发迹的必需途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人努力修习汉文学，形成了“光（宗）显（宗）之后，文士辈出，词赋四六秣纤，非后世所及”^① 的气象。

高丽后期是一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社会的政治、经济处于极度混乱之中。趁高丽国力极度衰竭，蒙古、契丹、倭寇先后大举入侵，使高丽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在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高丽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外患是内忧的必然结果，外族如此欺凌高丽民族是因为高丽的内部混乱、国力虚弱，而内忧完全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对人民的残酷掠夺所造成的。他们开始用冷静的眼光看待腐恶的现实，并以满腔热情呼唤当权者和全民族的醒悟。他们主动接受儒家的理想精神和中国唐诗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新的面貌登上文坛，创作了许多反映时代本质的优秀篇章。

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民族意识，带来了文学观念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学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与理论总结的出现。以李仁老为首的海左七贤派的文学观念，是在总结前代文学经验和清算当代文坛浮糜文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从改革文风的立场出发，对

^① 徐居正：《东人诗话序》，东西文化社 1989 年版，第 158 页。

当时风靡一时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真正的文学，是“触物寄兴”“感发意志”的产物，所以它应该反映现实，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李仁老指出，中国唐代著名诗人“诗圣”杜甫的诗之所以脍炙人口、相传不衰，就是因为他那为国、为君、为民之慨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稷契口中流出”^①。也就是说，文学是作家内心思想感情的真实表现，作家应时时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反映国家政治的好坏。他批判那些一味模仿唐诗的恶劣倾向，认为“不易古人之意而造其语……规模古人之意而形容之”的“换骨夺胎”法，“虽与夫活剥生吞者相去如天渊，然未免剽掠潜窃以为之工”^②，并强调继承遗产必须“托古改制”，必须做到“出新意于古人所不到者”。“海左七贤”派的另一个作家林椿则认为，那些把诗歌当作茶余饭后的“余技”而吟风弄月，或厚着脸皮模仿唐宋诗文的文风乃是“吾道之蠹虫”。他主张文学创作必须自然真实，不应“牵强摹写，失其天真”。他对科诗的形式主义深恶痛绝，说：“近世取士，拘于声律，往往小儿辈闲能取甲乙，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故朝野嗟冤，吾恐兹弊已久，不可一旦矫之。”^③“海左七贤”派的文人们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对文学特性加以阐述并对当代文坛弊病进行了批评，这对文学理论观念的发展无疑是一大推进。

高丽后期的李奎报是朝鲜文学历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诗

① 李仁老：《破闲集》卷中，大洋书籍 1978 年版，第 113 页。

② 《破闲集》卷中，大洋书籍 1978 年版，第 156 页。

③ 《西河集·遗皇甫沆书》，《朝鲜古典作家美学资料集》，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8 页。

人。他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文学观念的发展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总结前人遗产的过程中和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关文艺的一系列问题在文坛发表了重要的见解。

在朝鲜文学观念的发展史上，李奎报第一次系统而辩证地论述了文学创作中作品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夫诗以意为主，设意尤南，缀词次之。”在他看来，语言形式应该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服务，所以说“文中无含蓄深厚之意，则初若可玩，至再嚼则味即穷矣”^①。但他并没有因强调思想内容而忽视艺术形式，他指出：“含蓄意苟深，咀嚼味愈粹。意立语不圆，涩莫行其意。”深刻的思想内容固然重要，但他离开了生动的艺术形式就无从表达，因此他主张“语意得双美”，即一部作品不仅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还必须具备完美的艺术形式。他痛恨那些形式主义、拟古主义文风，说：“迩来作者辈，不识风雅义。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嗜。”^②他也辛辣地批判科诗所带来的模仿主义，说：“方今为诗者，尤嗜东坡之文，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他指出作家的艺术个性和独创性乃是作品生命力所在，作家应“贵新意”，他说：“创新意臻妙极，而若攘取古人已道之语，则有许底功夫耶。”^③从而提出了“创意造语”而“语意得双美”的

① 《论诗中微旨略言》，《李奎报作品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② 《论诗》，《李奎报作品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③ 《答全履之论文书》，《李奎报作品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命题。

著名文学批评家崔滋，在文学观上深受李奎报的影响。他也坚决反对模仿之风，主张发扬民族风格：“今之士大夫做诗，远托异域人物之美，以为本朝事实，可笑。”他高度评价李奎报，是因为李奎报的诗“皆不蹈袭古人，而卓然天成”，激荡着民族风格。他从儒家进步的文学功用观念出发，强调道、文的高度统一。他认为道是文学必须反映的重大内容，即传道是目的，文辞是必有手段。他指出：“文者蹈道之门，不涉不经之语，然欲鼓气肆言，竦动时听，或涉于险怪。况诗之作，本乎比兴之讽谕，故必寓托奇诡，然后其气壮，其意深，其辞显，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从他的其他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这里的“道”就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基础的“仁政”思想。他认为，文学离开了生动感人的艺术形式，就无“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也就无法达到传道之境。与李奎报一样，崔滋也重视文气的作用，他说：“诗以气为主，气发于性，意凭于气。”这里的“气”，即指作家的气质、才性。他主张气的后天性，说“初学之气生”“壮气逸”“老气豪”^①，认为气随环境和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发展。

高丽末期大诗人李齐贤非常重视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博学多闻。他在《送大禅师瑚公之定慧社诗序》中说：“所见者廓然，则所立者卓然，所验者灼然，则所守者确然矣。”他强调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认为“辞严而意新”的作品才能“喧万古”，打动后来者的心灵，长久不衰。他继承和发扬中唐诗僧皎然“文外之旨”的观点，提出了诗歌应有“不尽之

① 崔滋：《补闲集》卷中，大洋书籍1978年版，第293页。

味”。他说：“古人之诗，目前写景，意在言外，言已尽而味不尽。”他以兰香比喻说：“夜久静坐，明夜在牖，国香触可鼻观，清远可爱，而不可形于言也。”^①所以他特别看重寓意含蓄之作，因为其中“有言不传之妙”，给读者留下联想与回味的余地。李齐贤的这些文学观念，是与佛教文学观念的影响分不开的。

高丽时期高度发展的创作实践，为文学观念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特别是高丽后期，文人自觉摆脱形式主义、拟古主义和绮靡文风，对文学自身规律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逐渐地以有充实内容与高昂的感情基调的作品去取代内容苍白、形式雕琢的作品，终于找到了创作自己的时代所需的理想文学的道路，并且对这样一条道路作了具体深入、重点突出的理论表述：“托物寓意”“托古改制”“诗缘情”“创意造语”“谋及国事”“言外之意”。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观念的探索，这一时期艺术倾向上的共同特点主要表现为现实干预意识的增强、艺术形式的完善和客观艺术效果的追求。诸多前人长时期探索与追求的，到此时期都以其成熟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上，显示出朝鲜文学史不朽财富的耀眼光芒。

第二节 文坛局势与诗话的繁荣

高丽诗话产生于其后期，如今可看到的仅存四部诗话著作，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作者之手。所以，

^① 李齐贤：《栢翁稗说》后集一，大洋书籍1978年版，第429页。

仔细考察会发现，它们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和内容上的特色。诗话最初产生于中国北宋，宋仁宗时的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其先河。其卷头只说了一句话：“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句话反映出了它的内容、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宋高宗时的许颢在《彦周诗话》第一条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他们都不把诗话看作正经严肃的理论文字，而是当作随意漫谈，品评古今诗人和诗作，考订名篇、佳句，记述掌故和逸话。内容都是顺手拈来，信口说去，文字平易，语气轻松。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宋人的诗话并不全是“闲谈”“记异”，实际上他们的诗话还包含许多批评意见和理论见解。

高丽诗话直接继承宋诗话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态度，也都标榜以“遣闲”“补闲”“谈笑”“除烦”为目的。高丽诗话也往往写得娓娓动人，使人读来津津有味，仿佛在读轻松自如的漫谈散文或轶事类小说。高丽诗话所标出的“破闲”“小说”“补闲”“稗说”等题名，则充分说明其写作态度和艺术风格。然而像宋诗话一样，高丽诗话也在轻松的“闲谈”之中，含有许多珍贵的理论因素，在诙谐、闲散之语之下带人严肃的批评之意。这是高丽诗话批评的一个共同特色。这是在朝鲜诗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积极成果，为其后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诗话作品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丽诗话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主要反映在内容方面。《破闲集》是李仁老晚年写的诗话著作，也是朝鲜第一部诗话之作。李仁老生活在动乱的年代里，其时的政界，武臣横暴，文臣备受歧视，随时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不少文人或隐居草野或依托释门。李仁老虽身在官场，心却存山林和风月，与当时的高士林椿、吴世才等组织“海左七贤”，

常以诗酒游于自然。这是爱慕中国魏晋时的阮籍、山涛、向秀等“竹林七贤”而结成的诗派。李仁老、林椿、吴世才为“海左七贤”的主要人物，以他们为首的这一群体，逐渐成长作为一种诗歌流派。

武臣政权下的动乱岁月和与海左落乡文人们的密切交流，对李仁老的创作和文学批评观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对武臣政权初期残酷镇压和歧视文人深感愤慨，对纲纪的紊乱和现实的黑暗深表不满。他的长诗《行路难》，以激越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痛斥现实政治的黑暗，为自身理想未能实现和与现实的矛盾而吐露愤懑。他的散文《青鹤洞记》，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景象，以寄托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否定你争我夺、互相残杀、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还有，与他有深交的海左七贤派的文人如吴世才、林椿、赵通、黄浦沆、咸淳、李湛之等人都是当时被武臣当权者迫害或排斥的文人。他们饱学多才，以诗鸣于当代。他们怀才不遇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特别是在逆境之中的创作活动使他们感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文章有其自身的法则和独立价值，不为身份的高下和贫富而左右，文章“如日月之丽天”“云烟聚散于大虚”，普通的“布葛之士”也可因之而名垂千古。这种对文学独立价值的见解，在武臣“拳风”统治之下，正义之声在文学之士们备受镇压和欺凌的特殊环境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丽的汉文学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随着王权和社会的推移经历了多次变化。高丽初，其诗崇尚唐风，崔滋（国初）说：“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这句话反映出了高丽初期盛行汉文唐诗的情景。特别是晚唐诗风在很多文人中间产生了重要影响，郑知常等一代诗人就